

■ 田野笔记

父亲的怀表

北京第二届国际电影节刚刚结束。其中，有一部马丁·斯科塞斯导演的影片《雨果》，它是电影人自己给自己唱的颂歌，有些矫情。乍看这个名字，还以为是写法国大作家雨果的。正是因为名字上的误导，我不辞劳苦地去看了一回。虽然不免悻悻然，但电影中频频转动的钟表、发条、齿轮，还是让人生出不少感慨。



新京报插图/赵斌

□ 岳永逸(民俗学者)

上世纪晚期，不同年代都有各自的“结婚三大件”，即七十年代的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，八十年代的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，九十年代的空调、电脑、录像机。其实，这些都是城里人或发达地区的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总结，同期多数农村并非如此，城乡差距绝对不只十年。

在老家，父亲是个民办老师，边教书边务农(种地)的那类，所得的工资是公办老师的三分之一不到，还常常被拖欠。这样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和公办老师手腕上闪闪发光的上海牌之

类的机械手表不同，与父亲相伴的一直是块揣在上衣兜里的怀表。这块怀表约莫七公分见方，外壳呈浅黄色，并无怀表常有的表链，打开后能三面支撑平放桌上，秒针的转动声也格外清脆，“嘀嗒嘀嗒”。当年，这块怀表在村子里也是稀有之物。父亲每天怀揣着它往返于村小学与家之间，靠着它的指示上课下课。通常，我们小孩只有节假日才有机会触摸到怀表。没有父母的叮咛，自己也总是小心翼翼。当然，免不了偷偷带出家门，向小伙伴们炫耀一番。但最热衷的还是睡觉时，将这宝贝放在耳边，伴着“嘀嗒嘀嗒”声入睡。

或许是先天动手能力就差，虽然一直不明白怀表这个家伙怎么会发出那么清脆的声音，可从未动过拆开来看看的想法。这也是电影《雨果》让我有所触动的所在。在他

早逝的钟表匠父亲的影响下，那个法国小屁孩儿雨果居然将那么多表盘、发条、齿轮玩得溜溜转！

其实，父亲还有不少当年让我自豪的小玩意儿，放在桌上的蘸水笔、插在上衣袋中的自来水钢笔，乡下人很少会玩弄的笛子、二胡。当然，虽在公办教师面前低人一等，但因为这些物什，父亲也与村长、医生一样，是村里红白喜事时必请还坐上位的重要客人，属于有权威的一族。包产到户后，父亲反而少了大集体时的闲暇，更多地在地里刨弄。不但笛子、二胡束之高阁，直至扔掉，就是怀表和自来水笔也很少一本正经地揣在上衣兜里，而是忙忙跌跌地在教室和田地之间奔跑，更像个农民了。如今，老家村这一级已经没有学校了，手表也已经是过时的东西，父亲那块当年很多小孩都曾心向往之的怀表更是无人提及了。

■ 流行密码

忽然“中产”

几年前，一些中产阶级生活教科书，如《格调》、《品位》等在国内出版，“中产阶级”一词也频频出现在媒体上。中等收入人群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同。

□ 基甫(文化批评家)

中等收入人群开始意识到，中产阶级并非仅指中等收入阶层，而是一种属于中间社会阶层的“公共领域”、生活社群、公共生活空间，并进而形成一种与其公共领域相对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。一般而言，现阶段称得上中产阶级家庭的，应该拥有几套房子，有私家汽车，有稳定的和相对比较丰厚的收入，远郊可能有假日别墅。过年也不在城里呆着，全家去东南亚或香港过年，可以避开节日的喧嚣。孩子则需入私立双语学校，学点钢琴，读点经。家里有几条宠物狗或猫，若没有宠物，则要去给小区里的流浪猫喂食。平时不是去菜市场买菜，而是去麦德龙或城市超市去“采购食材”。没事在家里喝点红酒，品品咖啡或普洱茶。要不然就去打网球或去健身房、跑步、游泳。定期去瘦身会所做瑜伽，或来一次精油按摩。响应公益呼吁，在“无车日”乘公共交通工具，总体上遵循低碳、环保、乐活主义的生活原则。

然而，对于忽然中产的阶层来说，要养成中产阶级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，仍然是一个长期而又

艰巨的任务。他们也许是一群靠经济活动纠结起来的“乌合之众”，其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，依旧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，依旧只是对消费主义生活形态的模仿和依附。他们的前身是小资，更早前，则是小农或小市民，一不留神就会泄露出从前的面目。

至少从目前来看，中国的“中产阶层”在阶层文化形象确立上，还很难形成和赢得广泛的认同。人们从几本西方的小册子里，仔细地寻找着诸如怎样装潢卧室、怎样品味咖啡和红酒的指南、怎样收藏古董或艺术品，诸如此类的知识，试图从物质生活的表面，模仿和探索出某种“有修养”的生活。

这些依靠时尚的“格调”和“品位”涂料来粉饰个人空间的“中间阶层”，看上去鲜亮且令人向往，但经不起社会变化的考验也远不足以维系整个社会“金字塔”结构的稳定与和谐。在未来可能的社会变故中，他们将会在来自其他任何阶层的力量的冲击下，变得不堪一击。拙劣的东施效颦，一些没有来龙去脉和精神渊源的散户，在金钱的沼泽地里孳生的灰色蘑菇，装点着“中产阶级”的寒冷交替的早春季。

■ 印度行舟

哭了又笑 笑了又哭

在我回国很久之后，C还在我的facebook上留言说，JOJO，我依然在人群中寻找你的笑容。

我们认识得很意外，细想起来，却又似乎是必然。

□ 独木舟(青年作家)

进入D镇之前，破旧的大巴车在山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，暗得什么也看不见，在一个转弯之后，万家灯火连绵不绝地进入视野，就像整个星空被倒过来。我张大了嘴，惊讶得说不出话。

你应该自己去看看，否则你永远也不知道那样的景象有多美。

入夜，温度低得已经超过了我所能够承受的范畴，一进旅馆我就用电热杯烧了一壶滚烫的开水，没等它凉，就直接灌进腹中。门口一个好心的美国老太太说，我知道有一家餐厅很不错，我带你们去吧。那顿饭我和Jenny一人要了一碗汤面，一盘饺子，撑得几乎快吐出来，隔壁桌一个美丽的老太太一直看着我们笑。

同时在笑的，还有坐在柜台里的C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除了点单和结账，没有多说一句话。

我和Jenny在经历了两个月的朝夕相处之后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琐碎的龃龉，在D镇的头两天，我们经常分开行动，我背着相机去山里拍照，她在小巷子里寻找传说中的酸辣粉。这段同行的友谊岌岌可危，我们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疏离感横隔在我们中

间。谁也没有主动来打破它，整整两个月的行走，彼此都已经疲倦不堪，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，都报以顺其自然的态度。

那一天的上午，我在C家的餐厅里点了一份煎饼和一杯热牛奶，用WIFI上了一会儿网，在此之前我已经在网络世界里消失了半个多月。在私信中我跟闺蜜讲，我好累，好想哭。她说，没事，就快回来了，给你准备一堆好吃的，回来好好养着。这句话一弹出来，我就不争气地流下眼泪来，这一哭，就收不住了。

一个日本女人走过来问我，煎饼好吃吗？我泪眼婆娑地点点头，她看到我的面孔，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连忙欠身走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感觉到对面坐下来一个人，心想日本妞儿你有完没完，好不好吃你不会自己点一份吗？

一抬头，便看到C温和的笑脸，将一叠纸巾推到愣着的我的面前，轻声说，哭完之后，笑一笑。

我在印度的行程中接受过很多人大大小小的帮助，但这一次却有那么一点不同。我是一个不轻易示弱的人，再亲密的人也极少看到我的眼泪，可是那一天，我的脆弱与慌张，被这个近在咫尺的陌生人尽收眼底。我后来几乎是逃走的，甚至没来得及认真说声谢谢。

■ 糊涂读史

“告密者”袁世凯

除了后来称帝的倒行逆施，袁世凯最为后世诟病的，大概要算“告密出卖”谭嗣同等六君子，但仔细考证戊戌年云谲波诡的复杂局势，不难看出袁的“告密”并非决定变法成败的最关键原因。

□ 端木赐香(历史学者)

需要申明的是，慈禧是支持光绪变法的。变法前，娘俩具有一定的共识。只不过光绪在康有为的激进主张下一再触及底线，比如光绪擅自要免以礼部尚书怀塔布为首的六堂官(太后有言在先，任命二品以上官员，须得她亲自批准，而六堂官乃一品大员)，并提议开设懋勤殿(康党提出了议院、议政局、议政处、制度局等诸多花样，但在组织技术方面非常幼稚)，用茅海建的话说，从老佛爷的角度来看，光绪“已是两次发动政变”。

政局稍异，谣言四起，京城关于太后或康党要“兵变”的谣言都甚嚣尘上，且谣言与真相之间，还可来回置换。比如康党的围园谋后，就是典型的“这个可以有”。康认为，如果有八千人带兵围住颐和园拿掉太后，事情就Over了。北洋军队掌握在太后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那里，康却想忽悠北洋三军统帅为他所用。康先是动员维新同党、礼部主事王照前往游说武毅军统帅聂士成，为王照所拒。林旭提名甘军统帅董福祥，谭嗣同认为不可。康有为提议拉拢荣禄最后一个下属、新建陆军统领袁世凯，谭嗣同认为不可。但是实在没什么人可捞了，且康有为坚决袁世凯是可用之

人。于是中国历史就演出了戏剧性的一幕：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！

9月20日下午袁回到天津。当晚去见荣禄，没谈几句，有客来，只得作罢。9月21日一大早，两人再次见面。袁世凯和盘托出，荣禄大惊。同天，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，宣布重新训政，并下令捉拿康有为、康广仁兄弟。此时，太后既没有捉拿谭嗣同，给康的罪名也只是“结党营私、莠言乱政”。

当晚，北京政变的主要推手之一、管纪检的老臣杨崇伊御使到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之诏。一看老太后已经动手，荣禄即将袁世凯招来，三人商议，再不揭秘谭嗣同之事，自身不保，与其等着对方揭露，不如自己先报。于是杨崇伊9月22日离津回京。9月23日，慈禧太后才有了大动作，举行训政典礼，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，密谕捉拿谭嗣同等。荣禄怕审讯中牵涉到光绪，建议不审即杀。于是9月28日，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和康广仁同日弃市，是为“戊戌六君子”。9月29日，清廷公布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的罪状，由原先的“结党营私、莠言乱政”升级为“纠约乱党，谋图颐和园，劫制皇太后”。这就是所谓的袁世凯告密，它是事后自保性的补告，但加重了政变的程度。